



魏根深：集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

□ 蒋爱花 郎 朗

海外汉学家

他是外交官，曾作为欧盟驻华大使见证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风风雨雨；他也是一名汉学家，著有欧美汉学研究必备参考书《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他就是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个以新的视角、观点和思想研究中国历史的英国人。

与中文结缘

1941年出生于英国小镇的魏根深，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他的父母极为重视教育。1960年，魏根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奖学金，并进入国王学院学习历史，但他很快因为大学历史课所讲的内容与高中时期并无二致而感到厌倦。偶然的一天，他在逛剑桥书店时，翻到了两册残破的《汉语初级教科书》，一个个优美的汉字映入了他的眼帘，魏根深被深深吸引住了，他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决定买下这两本书，并开始自学汉语。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魏根深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位东方学系学长的推荐下，他常常光顾一家名为“杭州饭店”的中餐馆。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汉语老师”——与他年纪相仿的餐馆伙计侯新球，他们二人相约在侯新球的休息时间互相教授对方英语和汉语。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在经过几个星期的学习后，魏根深发现侯新球告诉他的发音和教科书上的发音对应不上，他去请教了之前的那位学长，学长告诉他侯新球所说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香港地区的方言。虽然魏根深的汉语水平没有提升多少，但他却从侯新球口中听到了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魏根深曾说，学习中文的过程，也是他接触、了解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过程。

在自学汉语一年后，魏根深希望可以聚精会神专攻中国史，于是他向学院的教授提交了转专业申请，并在半年后成功转入东方学系。当时的东

方学系，课程设置虽然齐全，但学生并不多。因为冷战的原因，俄语学习是大势所趋，如果换学中文的话，工作并不好找，可是魏根深义无反顾地扎进了汉语以及中国历史的学习中。

从外教到欧盟驻华大使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中国，魏根深一直在寻找前往中国的机会，在东方学系就读期间，他曾前往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办事处谋求职位，却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在他愈加沮丧之际，1964年5月，魏根深收到了办事处邀请他前往中国的明信片。魏根深抓住了这次机会，第一次踏上了他畅畅千万遍的中国土地，并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担任了两年的英文教师。刚到中国时，魏根深并不会说现代汉语，但他对一切充满了兴趣，课余时间积极参加中文课程班，并通过电台广播练习听力。有时，他还会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兼职做英文配音，他的中文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66年，魏根深结束了两年的中国之旅，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他的学业——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时期，美国国内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已经由欧洲逐渐转移到了美国，区域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这与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中国偏向文献解读、翻译的方式截然不同。1970年，在宋史专家刘子健和美国汉学家牟复礼的指导下，魏根深以区域史的研究视角，完成了名为《中国价格历史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该文以陕西北部的农作物价格变动为观察对象，集微观观察与宏观思考于一体。1971年，身为伦敦大学副教授的魏根深访学哈佛大学，哈佛任教的费正清在看过他写的研究笔记后，大加赞赏。1973年，魏根深在费正清的帮助下，授权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

1974年，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希望发展同亚洲各国的关系，开始物色熟悉东方的人才前往日本任职，魏根深在一位法国政要的推荐下成功入围，自此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在日本的第二年，魏根深接到了新的任务，即参与到欧共体与中国的建交中。对于这段岁月，魏根深曾说：“我参与了欧委会委员对中国的所

有访问，也参与了欧共体与中国建交的全程谈判。”这期间，他曾经同邓小平一起共进过餐，后来，他十分骄傲地把这段往事写进了《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

在中国任职期间，魏根深常去偏远山村调研义务教育的情况，除此之外，魏根深还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持推动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建立。在任职的7年间，魏根深一直积极推动欧盟的对华援助，且多用于教育合作。这些深入的实地考察以及同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使魏根深从深层次、多角度审视中国文化。长期的外交活动，更赋予了他全球视角，更好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魏根深卸下了身为外交官的职责，重新进入曾经工作过的哈佛大学，回归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学术道路上。2005年，他先后到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些经历让他获得了同中国史学界交流的机会。

沥尽心血撰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担任外交官期间，魏根深说他的休息只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外出旅行，其二便是写作。由于工作繁忙，实际上他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在2001年回到哈佛大学前，魏根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的修订工作上。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13年出版不同版本。魏根深多次修订后的《中国历史新手册》于2014年荣获“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奖，魏根深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汉学家。获奖并不是终点，2015年，魏根深接着推出了第四版，新书增加许多新内容，部分章节进行了重写，总词量相比1998年第一版的32万词，增长到了152万词。

2016年，在众多中国史专家的参与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魏根深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多方面优势，更容易以一种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诚然，西方学者出于知识体系及学术训练不同，难免从自身的角度与立场书写中国史，但他们独特的

视角与比较的方法，也让国内的中国史研究者受益匪浅，这也是本书受到国内史学界广泛好评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前言部分，魏根深提出了他写作本书的四个主要目标：第一，向拥有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背景的读者介绍从史前至二十一世纪的相关资料以及新的研究成果；第二，向学者们介绍中国历史的辅助学科，包括地形学、古代文献学、古代史学等；第三，介绍涉及中国史范围内当下焦点以及争论问题的重要二手资料；第四，利用电子资源对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传播、分析等。魏根深试图为非汉语学者提供便利，亦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崛起后，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状下，魏根深回应西方世界关切的强烈现实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越来越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了解中国的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变得十分必要。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援引的学术成果极为丰富，既包括10391种原始资料，也包括二手资料和数据库，涵盖了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论著，真可谓“学贯中西”。中译本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分为3册，由14篇组成，与英文原版相当。其中1—9篇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语言、地理、教育、思想、文学、饮食、史学编撰等；10—13篇则通过断代的方式阐述了先秦以来的历史演进；第14篇为目录学，其中不光介绍了竹简、收藏、类书等知识，甚至还罗列了当代的图书馆、书店，可谓包罗万象。

作为一位局外人，魏根深以世界史的视野，尽量以冷静、中立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演变的方式值得史学研究者学习。即使在获得“儒莲奖”后，魏根深也从未懈怠。2022年，最新版本《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出版，魏根深一如既往地回应读者提出的问题，同时加入近几年中西方最新的学术成果，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研究指南。

作为一名外交官，魏根深的外交生涯无疑是成功的；作为一名汉学家，他的学术贡献巨大。这就是身兼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的魏根深，一位传奇的外交官，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

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离不开人的主体作用和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和协调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正呈现出这样一种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对加强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日益增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任务。这些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得到充分体现，更好地转化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研究员）

20世纪90年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一简记：“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

参证《汉书》等史籍，“悬泉置”是长安通往西域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冯夫人是汉与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嫫。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汉宣帝“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使乌孙。

在两千多年前，一名侍女为何被称为“夫人”？又如何能在陪嫁西域后成了汉朝的“特命全权大使”？

（一）

汉武帝时，西域有三十六小国，匈奴设僮仆都尉管辖。控制西域是匈奴与汉抗衡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域三十六国之北有大国乌孙，拥有精兵十八万八千八百。汉武帝决策与乌孙“结昆弟”，“断匈奴右臂”，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将解忧公主嫁与乌孙昆弥（国君）军须靡。公主解忧与侍女冯嫫共历磨难，相濡以沫情同姐妹，一同去了万里之遥的乌孙。

解忧远嫁乌孙，正处汉艰厄之时，也因此乌孙处境困难。但解忧和冯嫫以坚韧和智慧在困境中坚守自己的使命。解忧学胡语、食胡食、骑烈马、遍访臣民；冯嫫“能史书”“内习汉事、外习西域诸国事”。冯嫫持汉节，以公主使者名义巡行西域诸国，所到之处慷慨赠，宣示大汉威德，介绍中原文化和农耕水利等技术，赢得各国君民信任敬重，被尊称为“冯夫人”。冯嫫与乌孙位高权重的右大将结为伉俪，与解忧携手扩大了汉的影响。

乌孙亲汉，匈奴对此不能容忍，于公元前74年大举进攻乌孙，威胁交出解忧，与汉绝交。解忧和当时的昆弥翁归靡一面率军民抵抗，一面向汉求救。当时汉昭帝猝死。宣帝继位稳定朝局后，公元前71年发十五万骑兵，分五路出击匈奴。西部匈奴的日逐王率众降汉。

因解忧、冯嫫广布恩德，乌孙军民奋勇抵抗，3年多始终未让匈奴攻入伊犁河谷。闻汉出兵，翁归靡亲率五万精骑反击，直捣匈奴右谷蠡王王庭，斩获单于父行、名王以下四万级，马牛橐驼等七十余万头。解忧、冯嫫30年的耕耘，促成了乌孙与汉东西夹击匈奴的构想。

（二）

翁归靡去世后，立泥靡为昆弥。解忧为了汉乌大业，依胡俗再嫁泥靡。但泥靡暴恶不得人心，与解忧不和，欲背汉依附匈奴。公元前53年，解忧与汉朝使者魏和意、任昌决议借酒会刺杀泥靡，但未刺中要害。泥靡负伤逃走后，召集兵马将解忧等围困在赤谷城。数月后安西都护郑吉率兵赶到才解围。

眼看乌孙有落入匈奴手之虞，汉只得派军远征。在西域将毁于兵火的关键时刻，冯嫫挺身而出，冒险前往乌就屠驻军的北山，以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乌就屠施压，分析利害、晓之以理。乌就屠心怯理屈，表示愿服从汉，由汉分封元贵靡和他为大、小昆弥。

为妥善解决乌孙事态，冯嫫应召入朝，向汉宣帝讲述西域情况并提出建议。汉宣帝赞许她的意见，拜为持节正使，派有关官员随她赴乌孙办理。

于是有了悬泉置竹简所记。已年届七旬的冯嫫两个月奔波近二万里，“以骑马助传马”星夜赶到长安又赶返赤谷城，诏元贵靡、乌就屠拜见汉典属国常惠，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一场战争的军事实力对乌就屠施压，分析利害、晓之以理。乌就屠心怯理屈，表示愿服从汉，由汉分封元贵靡和他为大、小昆弥。乌孙附汉导致匈奴在西域的统治瓦解，汉设安西都护府，莫立了对西域的管辖。

元贵靡死于公元前51年。年逾七旬的解忧和冯嫫扶立孙子星靡继位乌孙大昆弥后，得以回故土养

汉简中的一段西域史：解忧公主与冯夫人

□ 路向军

老。不想3年后得讯：星靡懦弱，乌孙政局动荡。当时解忧已逝世，古稀之年的冯嫫请缨再赴西域，监国辅政。

（三）

欧亚大陆商道虽在公元前7世纪就有记载，如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国《竹书纪年》等，但在汉奠定对西域的管辖以及解忧说服乌孙政权开放通往葱岭（帕米尔高原）外的大宛、康居口岸后，才得以开通并形成规模。

从中国内地远至天竺、安息、地中海地区，各民族进行着频繁的经济交流，“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国输出的物产有丝织品、铁器、纸张等（西域多处遗址有西汉丝织品、铁器、麻纸质发现）；输入的有良马、毛皮、葡萄及葡萄酒、苜蓿、胡麻等。棉花可能也早在汉代就沿丝绸之路和西南商路传入中国（西域民丰汉墓出土有棉布及纺轮）。

欧亚各民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西方的佛教、祆教、景教和音乐舞蹈等东传。中国的礼仪和农业、水利、建筑等技术西传。如解忧、冯嫫率同随从，将先进的农耕和水利技术教授给牧业传统的乌孙人民；解忧的次子万年被莎车国君民迎为王储；长女弟史被龟兹国王绛宾迎娶为后，还一同到长安学习汉文化。他们在本国都仿汉仪礼衣服，建城郭、教农垦、修井渠。

这些在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事件，均发生于解忧、冯嫫在西域的时期，并且与她们的活动直接相关。二位女杰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作出了贡献。



（上接1版）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于现代化进程具有基础性重大意义。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没有工业革命及其直接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正是通过新中国70多年的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国基本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化基础、市场化条件、城市化实力以及科学技术和智能革命的强力推动，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满怀自信地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致力于完成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现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胜利实现，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发

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是被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径，这也是在我国新发展阶段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路径。一方面，市场必须有效，这就是要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聚焦到搞活各类实体经济、增强经营主体生机活力上来；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有为，这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职能，有效规范资本行为，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更好保障资本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和主体、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高体现。我们党领导开创并奋力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好设想变为现实，集中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国家、不同性质的现代化，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走着不尽相同的现代化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资本的固有特性是利益无限驱动，带来的必然是对内剥削和奴役、对外扩张和掠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如影相随，利益分化、阶级对抗、极端个人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等“现代社会病”严重制约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甚至造成人的主体性失落和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经